

康雍乾三朝

易学研究

Kang Yong Qian SanChao
YiXue YanJiu

袁江玉◎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康雍乾三朝

易学研究

袁江玉◎著

Kang Yong Qian SanChao
YiXue YanJiu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雍乾三朝易学研究 / 袁江玉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143-2483-9

I. ①康… II. ①袁…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326 号

康雍乾三朝易学研究

作 者 袁江玉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45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 978-7-5143-2483-9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清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在其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名家名著层出不穷，灿若星汉，如陈梦雷、李光地、胡渭、惠栋、钱大昕、纪昀及《周易折中》、《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等。最高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众多一流学者的精心研读，一批集大成著作的相继问世，“两派六宗”等总结性理论的系统推出，都使得延续数千年的易学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呈现出新的面貌，展示出新的发展方向。清代康乾易学的巨大成就，也始终吸引着后世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在相关领域的积极探索，为当代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基础和土壤。

江玉博士数年前跟从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敏而好学，勤于深思，将主要精力放在易学与明清文化的研究上，最终撰成《康乾易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顺利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呈献给各位读者的这本书，就是以该论文为基础经过充实、完善而完成的。本书大量占有和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认真吸收和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易学的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立意新颖，视野开阔，重点突出，脉络清晰，论述充分，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历史线索和逻辑线索的结合都做得较为成功。

在宏观方面，本书尤为关注清代康雍乾三朝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大趋势，注意到易学与社会史、学术史的互动关联，将易学置于当时的学术大背景下加以系统考察和探究；在微观方面，则对康雍乾时期易学研究及运用方面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进行了缜密、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且重视发现和使用文集、笔记、奏折、实录、起居注中的新史料，多出己意，颇见功力，特别是对帝王易学的论述更是多有独到之处和精彩之笔，弥补了以往易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有着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通观本书，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专业研习和工作实践，江玉博士已经具备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治学严格遵守传统学术路数和学术规范，同时注意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注重原创，使全书体现了可贵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表现出良好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都较为突出。相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将会大大有助于中国易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以及明清史研究的开拓和深化，有助于国内外相关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在此也衷心祝愿江玉博士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学术征程上与时偕行，精益求精，不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为包括易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张 涛

甲午年盛夏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

绪 论.....	1
(一) 研究范围及选题意义	1
(二) 学术史回顾	4
(三) 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9
一、 康熙帝的易学.....	11
(一) 易学与康熙帝的文化政策及学术崇尚.....	12
(二) 易学与康熙帝的宇宙观、宗教观及人性论.....	15
(三) 易学与康熙帝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19
二、 陈梦雷的易学.....	24
(一) 《易》之蕴在理数象占	25
(二) 存《易》道于己	32
(三) 推《易》道于民	37
三、 李光地的易学.....	44
(一) 推尊四圣四贤	44
(二) 论《周易》体例	49

(三) 易学与李光地的心性道德学说.....	58
(四) 易学与李光地的社会政治观.....	64
四、胡渭的易学	72
(一) 考辨河图洛书	74
(二) 考辨五行九宫	81
(三) 考辨先后天诸图	85
(四) 考辨卦变说	94
(五) 驳斥象数流弊	103
(六) 对胡渭易学的评价	106
五、《周易折中》	108
(一) 博采众说, 折中于朱熹	108
(二) 《易》之书与自然造化	110
(三) 《易》为穷理尽性至命之书	114
(四) 《易》者成大业之书	119
六、雍正帝的易学	127
(一) 易学与雍正帝的文化政策及学术崇尚	127
(二) 易学与雍正帝的政治思想	129
(三) 易学与雍正帝的密折制度	135
(四) 易学与雍正帝的祸福观	136
七、乾隆帝的易学	138
(一) 易学与乾隆帝的文化政策及学术崇尚	138
(二) 易学与乾隆帝的复性说	142
(三) 易学与乾隆帝“敬天法祖勤政亲贤”的政治纲领	144
(四) 易学与乾隆帝的御民策略	151
八、惠栋的易学	156
(一) 惠栋生平学行述略	156

(二) 重构汉儒易学	159
(三) 驳斥宋儒易学	165
(四) 《易》者赞化育之书	169
(五) 惠栋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76
九、《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	178
(一) 两派六宗说	178
(二) 对汉易的评论	180
(三) 对宋易的评论	185
十、纪昀的易学	191
(一) 《易》以天道明人事	192
(二) 论易学宗派	193
(三) 调和汉宋与扬汉抑宋	195
结 语	198
(一) 汉易与宋易的此消彼长	198
(二) 内圣与外王的研《易》旨趣	200
(三) 易学思想是康雍乾思想史的主潮主旋律	201
附录：康雍乾易学年表	203
参考文献	213
后 记	221

绪 论

（一）研究范围及选题意义

康雍乾三朝历时一百三十余年（1662—1795），约占清朝统治时间（1644—1912）的一半，是清朝发展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地位颇为重要，本书就以这一时期的易学为考察和论究对象。康雍乾时期，满清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史书通常将其誉为“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以社会发展状况和皇位的更替为依据的，而不是基于学术的发展规律。学术的发展和演变是相对独立的，与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并非完全一致，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延展性。就易学的研究旨趣和特色而言，康熙朝以宋易学为主，乾隆朝则以汉易学为主，两者截然不同，风格迥异，将康雍乾时期的易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研究，并不是以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准来划分学术，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康雍乾时期是学术由宋学向汉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而这一转型首先是在易学领域拉开帷幕的，在易学领域表现最为明显，考察这一时期易学的演变轨迹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宋学向汉学转型的认识和理解。顾炎武、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人都是在清初考据学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们考据经典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易学方面。例如，顾炎武对图书之学的考辨是他的考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斥责图书之学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认为图书之学和先天易学出于道教系统，完全不是圣人之《易》的本来面目。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考易学之源流，辨河、洛之是非，论证象数之学非《周易》经传的本来面貌，对考据学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朝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曾受学于黄宗羲，其考据学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黄氏的启发。黄宗炎继起于后，著《图学辨惑》和《周易寻门余论》，立足于考据学立场，清除道教方术对儒家之《易》的影响。毛奇龄著《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等，提倡朴实的考据学风，揭穿宋儒以河图、洛书篡改《周易》的谬误。胡渭著《易图明辨》，追本溯源，

条分缕析，对清初学者考辨宋儒图书之学做了系统总结，成为清朝汉学的先驱。因此，厘清汉易学兴起的历程是研究宋学向汉学转型的关键。目前，学术界通常将乾嘉之前的宋学和乾嘉时期的汉学分别看待，研究宋学的不牵涉汉学，研究汉学的不论及宋学，对康雍乾时期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历程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将康雍乾三朝的易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仅有利于揭示宋学的式微，而且有利于探索汉学兴起的学术渊源，从而加深我们对康雍乾时期学术转型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康雍乾时期是易学与社会政治结合极为密切的一个时期，将康雍乾时期的易学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考察，对我们研究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和“康乾盛世”出现的原因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周易》是智慧之书，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往往将《周易》视为“圣帝明王致太平法”，从《周易》中汲取政治智慧以提高执政水准，易学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康雍乾时期，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康熙帝提出“以经学为治法”^①的思想，雍正帝和乾隆帝秉承而尊奉之，三位皇帝都将《周易》视为治国宝典，易学与政治的联系空前密切，他们的统治思想和政治策略处处闪烁着易学的影子。清廷主持纂修的几部易学著作也都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着重发明帝王之术，阐述治国之道。《日讲易经解义》深明经世之道，“大旨在即阴阳、往来、刚柔、进退，明治乱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长，以示人事之宜，于帝王之学最为切要。”^②《周易折中》则将《周易》视为“成大业之书”^③，着力发挥《周易》的济世理民之道。《周易述义》多推阐《周易折中》之蕴，“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④。这些官修易学著作都是清廷“崇儒重道”政策的重要产物，进一步密切了易学与清朝政治的联系。陈梦雷、李光地等儒臣也多借助易学推阐王道之治，阐发君臣之道。总之，康雍乾时期，易学与政治的联系是空前密切的，考察康雍乾三朝的易学对于理解清初统治者政治思想的连续性和盛世局面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易学是围绕诠释、解说《周易》经传而形成的一门体大思精的学问，

① 《日讲易经解义·序》。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日讲易经解义》提要。

③ 《周易折中》卷首，《义例》。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周易述义》提要。

内容庞杂，思想宏富，涉及哲学、宗教、史学、文学、政治、历法及乐律等诸多方面。历代注释《周易》经传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倾尽毕生的精力也难以尽阅。康雍乾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繁盛时期，易学著作更是多如牛毛。据统计，《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易类四百二十三部、凡二千三百五十五卷，辑佚九十五部、二百九十六卷；《〈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一百八十六部、凡一千二百零八卷；《〈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七百八十六部、凡三千八百四十五卷。^①其中康雍乾时期占一多半，想要一一查阅检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易学家和易学著作加以分析，窥一斑以见全豹。

本书选取了八位人物和两部著作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陈梦雷、李光地、《周易折中》、胡渭、惠栋、《四库全书总目》、纪昀，这些人物和著作在清朝易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代表了康雍乾易学的主流。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虽不是专以易学名家，但他们都推崇《周易》，具备很深厚的易学功底，以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和感召力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学术界多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忽略了其在易学方面的贡献。本书对他们的易学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陈梦雷、李光地、纪昀三人既是官位显赫的儒臣又是学术史上具有突出贡献的学者，陈梦雷曾主持编纂了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李光地主持编纂了《周易折中》，纪昀主持纂修了《四库全书》，在文化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故将其列为考察对象。《周易折中》和《四库全书总目》是官修著作，《折中》代表了康熙朝官方易学的最高水平，撰成后读书士子纷然影从，将其奉为诠释《周易》的经典性著作，影响极为深远。《四库全书总目》为《四库全书》所收录的一百五十八部、存目三百一十七部易学著作撰写了提要，进行了评价，俨然一部中国古代易学史，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两部书是研究康雍乾易学不可忽略的著作。胡渭是清初考辨图书之学最为系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代表了康雍乾时期《易》图书学考据的最高水平。惠栋则以恢复汉易为治学宗旨，对汉易进行钩稽考证，引申触类，使千又五百年之绝学粲然复章，是当之无愧的汉易学的奠基者，是乾隆年间汉学易的代表人物。所以，通过对以上人物和著作的研究，大体能揭示康雍乾易学发展的线索和轨迹。

①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易类拾遗概谈》，载《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

(二) 学术史回顾

学术界对清朝易学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之前,一些学者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成果,但还远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8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清朝易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但是,与汉代易学和宋代易学的研究相比还稍显薄弱。本书以康雍乾时期的易学为考察和论究对象,以期对清朝易学研究有所裨益。兹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主,按时间顺序,对康雍乾易学的研究状况做一简略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许多学者对清朝易学进行了初步探讨和研究,关于清朝易学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不断推出,研究范围得到不断拓展,方法也趋于多元化。随着专人专书个案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从宏观角度论述清朝易学的著作越来越多,学术质量和水准也进一步提高。目前所见,涉及康雍乾易学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几部:

1986、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上、中两册),该书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易学,探讨了易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其后,该书又经过多次修订和出版。台湾蓝灯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出版分别于1991年、1994年、2005年出版了修订的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该书第九章“道学的终结和汉学的复兴”,系统论述了清朝前中期的易学,对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惠栋、张惠言及焦循等人的易学思想做了详细论究。作者认为:“清朝易学著作的内容和倾向也很复杂,有尊义理之学的,有言象数之学的,有阐发程朱易学的,有倡导或批驳图书之学和邵雍易学的,也有调和义理和象数两派观点的。”“清朝的易学及其哲学,就其理论思维发展的总趋势来说,是由高峰走向低谷的。这是同清朝经学和哲学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也是同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历史相适应的。”^①这些观点为后学者进一步研究清朝易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刘大均的《周易概论》一书于1986年出版。他认为,《周易》研究继明朝衰微之后,清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清初,汉易得到重视,但宋易仍居于统治地位,在统治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汉、宋易并盛的繁荣局面。“将汉宋易掺杂糅合在一起的作法,经过康、乾两代的提倡,使汉易在

^①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四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第6页。

复萌之后，终于站稳了脚跟，并形成清人易学研究中，汉宋诸家之易百家争鸣、长期并存的局面，成为历代易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①作者还指出，顺、康、乾年间文字狱的兴盛，是汉易最终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对于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总目提要·易类》，他认为其对易学著作的评价有一定的眼力和学术功底，但存在“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最后，他总括清朝易学的发展说：“如果说我国两千余年的易学研究，确为汉、宋两大家，清儒则以其敢于争鸣的学风和丰富的易学著作，成为我国汉、宋及诸家易学的荟萃者、总结者。尤其是他们对泯灭达一千四五百年之久的汉易的发掘和整理，更是功垂后人，永存易史。”^②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清朝易学的发展特征和学术地位。

台湾学者徐芹庭的《易学源流》（台湾编译馆，1987）一书，对清朝易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述。作者按研究角度和取向的不同，将清朝的易学划分为十六部分并做了简略论述，它们分别是：（1）清朝皇室之易学；（2）程朱派之易学；（3）其他理学派与义理派之易学；（4）象数派之易学；（5）清朝图书之学；（6）疑古派之易学；（7）考据音韵派之易学；（8）佛老心性派之易学；（9）占筮派之易学；（10）史学派之易学；（11）集解派之易学；（12）辑佚派之易学；（13）其他述者；（14）周易条例之撰述；（15）清史艺文志所著录之易学；（16）清朝民初之易学。作者以《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存目》所收易学著作为主，并涉及清人文集和笔记，对整个清朝的易学进行了概述，基本描绘出了清朝易学发展的大体轮廓。

台湾学者林庆彰著《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文津出版社，1990）一书，对清朝初期的《易》图、书辨伪学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黄宗羲、黄宗炎兄弟，以及朱彝尊、毛奇龄和胡渭等人对《易》图学的考辨，并对其在思想史、经学史及辨伪学史上的意义做了评述。

廖名春、康学伟和梁韦弦合著的《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一书，在“明清易学”一章中对明清易学发展的线索进行了梳理，认为明清易学由两大发展阶段构成：明初至清初是宋易阶段；清中叶至清末是汉易阶段。明清的宋易具体包括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两部分，清初的义理易学主要

① 刘大均《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217页。

② 刘大均《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第226页。

有孙奇逢的《读易大旨》，王夫之的《周易稗疏》、《周易外传》和《周易内传》，以及李光地主持编纂的《周易折中》，其中以王夫之的成就最为突出。作者还指出，汉学是清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主潮，所以清朝易学的突出特点是汉易盛行。但是，作者又认识到清朝的汉易不同于以前历史上的汉易，认为将其称为“考据易学”或“朴学易”更为妥当，并对清朝“朴学易”的发展做了详细评述。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新颖性。

李开著《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对惠栋一生的学行进行了论述。在该书的第六、七、八这三章中，作者对惠栋的《易汉学》和《周易述》做了介绍，揭示了惠栋的治易特点和易学贡献。

汪学群著《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将王夫之易学置于清初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中考察，力图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及学术变迁等方面的分析，把握其易学的时代精神及特色。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社会史、学术思想史和易学史相结合，详细而清晰地揭示了王夫之对《周易》原典诠释的新义和他的易学思想贡献。作者认为，王夫之“易学思想，博大精深，非哲学所限，在伦理学、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在易学史上独树一帜。如果说他的学术思想是对宋明理学的总结，那么其易学则是对宋以下义理易学的集大成。”^①此书是研究王夫之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

杨效雷的《清儒易学举隅》（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3）一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清儒《易》著，以义理易学、象数易学和考据易学为纲，分别评述了王夫之、李塨、惠栋、张惠言和焦循的易学成就，以及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学者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考辨和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二人是乾嘉考据学派的杰出代表）对汉易古注的辨驳。该书窥重点以见一般，对清朝具有代表性的易学家进行探析，基本揭示了清朝易学的成就，但是此书未能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清朝易学演变的轨迹和趋向，没有探究宋易和汉易的此消彼长。

2004年，汪学群又推出了《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一书，对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间撰写、刊行的易学著作进行了探索。该书导论部分阐述了清初经学与易学的关系，认为清初“经道合一”的经学特色对易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对我们深入揭示清初易学的特征提供了重要

^① 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页。

的参考坐标。全书共分为六章，分别是明遗的宋易学、明遗的程朱易学、明遗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清廷的程朱易学、儒臣的程朱易学、儒臣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该书力求两个结合，一是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考察清初易学与社会史的互动关系；二是文献与思想史相结合，从易学原著出发，重点揭示易学家的思想贡献。作者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清初易学在思想上的贡献。他认为，清初易学家在兼顾象数、义理的基础上，侧重义理，视《周易》为明理之书，对《易》、天道、人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在人性及道德修养方面，指出了《周易》对人内心精神世界探讨的积极意义。

唐明邦、汪学群合著《易学与长江文化》一书，分四个部分论述了清朝长江流域易学发展状况。关于清初的长江易学，作者探讨了方以智的思辨易学、王夫之的哲理易学、黄宗羲的批判易学和胡渭的考据易学，并将其特征归纳为批判与发展，即“发挥易理，经世致用”、“改造批判宋易”^①。清中叶的长江易学，探讨了惠栋的汉易学、张惠言的虞氏易学和焦循的数理易学。他说：“此时长江易学的总体特征是从宋学对《周易》义理的阐发转向对汉易的解说，也就是说清中叶的长江易学是以考据学为中心的汉易学，清朝汉易以推崇和解说汉易的象数之学为己任，或以汉易为正统，这是主流。”^②

刘保贞著《〈易图明辨〉导读》（齐鲁出版社，2004）一书，对胡渭的生平、《易图明辨》的写作背景及主要内容等进行了阐述，指出了胡渭考辨图书之学的成就和不足，是目前为止研究胡渭易学最为系统、详细的一部著作。

张涛先生《〈周易述〉导读》（齐鲁书社，2007）一书，对《周易述》成书的主要背景和渊源，惠栋的易学思想和《周易述》的治《易》特色，惠栋的易学史、学术史地位与《周易述》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周易述》的主要版本进行了阐述和考证，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惠栋易学奠定了基础。

郑朝晖著《述者微言：惠栋易学的逻辑化世界》（人民出版社，2008），剖析了惠栋的思想发展历程，指出惠栋在重构易汉学的基础上以卦气说为基础将取象说、升降说、明堂论贯为一体，其卦气说已剔除了天

① 唐明邦主编《易学与长江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62页。

② 唐明邦主编《易学与长江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339页。

人感应论的内容。还指出惠栋在易学上有两个重要理论贡献，即兼两说与既济论。

汪学群的《清代中期易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一书，以康熙朝晚期，以及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易学为研究对象，“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清朝易学，力图揭示其学术特征及宗旨，勾勒出其承传发展轨迹，突出其思想贡献及历史地位”^①。作者将清朝中期易学梳理为“宋易学的继续”、“汉易学的复兴”、“汉宋兼采的易学”和“构建易学的新尝试”四部分，通过论述剖析，认为就学术而言，清朝中期易学博大、多元化，是传统易学的整理和总结时期；从思想史上看，清朝中期是复兴古学的时期，受传统学术藩篱的制约，学术集大成有余而思想创新不足。

另外，还有几部提要性质的著作，简要评述了康雍乾时期比较重要的易学著作，如尚秉和著《易说评议》、《易学群书评议》，潘雨廷著《读易提要》，张善文著《历代易家与易学要籍》，其中涉及了清朝许多易学名著和名家。他们虽然没有从宏观角度揭示清朝易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但为我们深入研究清朝易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除以上学术著作外，以单篇形式发表的期刊论文也是康雍乾易学研究的一大重要成果。关于清朝易学研究的论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新的学术观点层出不穷，极大地推动和深化了康雍乾易学的研究。尤为可喜的是，随着学术界对清朝易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将清朝易学作为选题对象，如陈修亮的《乾嘉易学三大家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对乾嘉时期的三位著名学者惠栋、张惠言和焦循的易学进行了详细研究。苏晓晗的《船山易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考察了船山易学的建立情况、船山易学的基本特征、船山象数易学的基本内容，以及船山易学视野背景下的天人关系。乔宗方的《〈周易折中〉易学思想评析》（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从象数观和义理观两个方面对《周易折中》进行了系统探讨。孙照海的《乾嘉易汉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对惠栋、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毕沅、《四库全书总目》、纪昀、张惠言、焦循、章学诚和崔述等人及著作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其在易学上的贡献和地位。

^① 汪学群《清代中期易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页。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本书选取八位人物、两部著作，以时间为线索对其进行剖析研究，着重揭示康雍乾易学演变的趋向与规律，同时致力于梳理易学与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理学及学术史的相互关系。目前，学术界对康雍乾易学的研究，存在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史料的运用有待创新，以及对易学与社会的关系考察缺少深度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尝试性的创新：

第一，进一步拓宽康雍乾易学研究的范围。前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典籍授受、经传注释和学派演变等，关注的是专治易学且有易学著作传世的易学家，对那些也曾研究易学、运用易学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传世的历史人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他们不仅研读《周易》，而且积极将易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在易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绝非一般读书士子所能比拟。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专门阐述三位帝王的易学思想的论文和著作，这与他们在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本书将他们的传世文献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他们的易学思想进行初步梳理。

第二，立足于新史料的发掘和应用。本书以考察专门的易学著作为主，同时充分利用文集、笔记等相关材料。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御批奏折、《御制文集》、实录和起居注等文献中有许多易学方面的史料，都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陈梦雷的《松鹤山房文集》，李光地的《榕村集》、《榕村语录》，以及纪昀的《文集》、《阅微草堂笔记》等都是研究他们易学思想的重要史料。中国史学界自古有“以诗证史”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以诗证史”方面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其《元白诗笺证稿》是“以诗证史”的典型范例。广义的“以诗证史”，是指将一切文学作品当做史料来研究历史，举凡中国古代的诗词、文论、小说、寓言和政论等，都可以视为史料。“以诗证史”在研究康雍乾易学方面有着极大的应用空间。例如，康熙帝《御制文集》中就有许多与易学有关的诗文，其《经筵进讲周易》、《暑将退》、《乾清宫读书记》和《宝座五屏风铭》等，都是研究其易学思想的珍贵资料。乾隆帝更是以擅长作诗而闻名，一生留下的诗词达四万余首，其中有许多是以易学为题材或摘录《周易》语句编写而成，例如《乾清宫铭》、《坤